

方維保

文學的人民性問題在世紀之初漸漸的為理論界和創作界所重視，我在2004年《文藝理論與批評》第六期發表了「人民性：危機中的重建之維」一文。文章發表後，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¹。這樣的意見大體可以將其歸納為兩點：一是認為我把「人民」等同於「底層」，把「人民性」等同於「階級性」，是錯誤的。這樣會導致許多惡劣的後果，那就是把「人民寫作」等同於「為底層寫作」，從而把白領文學、小資文學都驅逐於人民文學之外。二是，認為人民應該是廣泛的，人民就是公民；人民性就是公民性。針對對於人民性的諸多理解，我認為有必要對人民性進行更為細緻的討論。

要討論人民性，當然要首先討論「人民」的涵義。

人民和人民性是與民粹主義思想密切相關的一種思想體系。從文化史進行考察來看，「可以肯定的是，民粹主義的始作俑是盧梭，不是俄國那批『要做鞋匠』的青年軍官和平民知識份子。法國人說，誰也沒有像盧梭那樣，給窮人辯護得那樣出色」。平民知識份子別林斯基、杜勃羅留夫、赫爾岑等人「在睡覺以前不是祈禱，而是閱讀馬拉和羅伯斯庇爾的演說」。俄國革命黨人「用俄語復述當年盧梭以法語呼喊過的一切，讓 雅克的平民社會觀才獲得了一個舉世承認的學名 hapoghuiocmto『民粹主義』」²。雖然如此，真正的民粹主義不是出現在法國，其真正的代表也不是盧梭，盧梭思想代表的是啟蒙主義，其「回到自然」說並不是民粹主義所理想的農民「村社」，而是抵制異化的策略。法國不是民粹主義的「故鄉」，倒是俄國一大批平民知識份子將民粹主義發揚光大，形成一種有著廣泛影響的社會政治運動。民粹主義的人民性思想的產生源自對俄國鄉村人民苦難的深切關懷和同情，是俄國資產階級理論家別林斯基提出的。它所要表達的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晚期沙俄統治下人民苦難生活的深切同情。

顯然，在俄羅斯民粹主義知識份子那裏，人民就是那些「鞋匠」，那些生活在社會下層的貧民，尤其是那些出於苦難中的俄羅斯農民。

在中國文化史上，知識份子與人民是一個很好理解又被主流政治搞得糾纏不清的兩個概念。在中國近現代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中，「人民」的界定是與左翼的民族國家想像和政黨策略密切相關的。在中國左翼文化最大的代表毛澤東的詞典中，人民這個概念是變動不居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內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被納入「人民」的範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們又被驅逐了出去，變成了人民的對立面「敵人」；在抗日戰爭時期，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他們又回到了人民的人民的行列之中來；及至第三次國

內戰爭和1949年之後，他們再次變成了「敵人」。知識份子則一直看作是「小資產階級」的，他們的地位和身份很特殊，既不是人民也不是敵人，他們是動搖的、依附的、防範的對象。當國內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都被「消滅」之後，知識份子於是就成了「敵人」，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一年「文化大革命」，知識份子實際都充當了敵人，而被專政。1978年後，隨著改革開放，才重新界定了知識份子的「人民」身份。而這樣的界定的一個基本前提就是，體力勞動是勞動，精神勞動也是勞動。於是，知識份子就成了人民。同樣的待遇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又被給予了那些「先富裕起來的人」。

其實，知識份子躋身人民的行列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現代中國，都與知識份子的自卑意識有關。俄國知識份子群體的一個傳統是懷有強烈的自省和自責意識，受俄國民粹主義思想的影響，在十九世紀俄國社會生活與文學藝術中，一直存在著一種「懺悔的貴族」，它們一方面為俄國的嚴重落後和下層人民的悲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面又為自己的渺小無力而自責，俄國白銀時代著名宗教哲學家布林加科夫說：「俄國知識階層，特別是它們的前輩，在民眾面前固有一種負罪感。這一種『社會的懺悔』，當然不是對上帝，而是對『民眾』或『無產者』。」³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深感自身的脆弱和無能，希望通過自身的人民化，以自我救贖。中國現代也存在著這樣的一個「懺悔貴族」。蔡元培提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魯迅面對著人力車夫的「仰視」的崇拜感受，郁達夫甚至為自己接觸了一個煙廠女工而沾沾自喜，感到靈魂受到了洗禮。尤其是1949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到整肅的知識份子，尤其希望獲得了「人民的身份」。

所以，1978年後，廣大的知識份子階層把自己看作是人民，在情感上是可以理解的，如同王先生一樣，他們對把自己從「人民」之中排除出去，有著深深的恐懼；他們也會如王先生一樣，會用所謂的精神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共同性這樣的左翼話語邏輯來為自己的人民身份辯護。中國當代語境下的廣泛的「人民」的概念產生了：「知識經濟時代的勞動不可能不包括精神勞動」。就是在王先生所特別提到的「知識經濟時代」也是如此。

在人民的概念被泛化的背景下，人民就成了公民。公民已經泛及社會所有人群，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是公民，當然也就是人民。不但包括「勞力者」的勞工、勞農階級，也包括「勞心者」的知識份子階層、官僚階層、中產階級階層。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之下，知識份子的人民身份最初是為了為知識份子「平反」，但它同時也抹殺了知識份子與平民百姓之間的差別。這樣的抹殺在當時對於知識份子來說是一種「待遇」，但卻同時也為知識份子免除自己歷史責任感打開了方便之門。同樣，當那些城市中產階級也成為「人民」的一部分的時候，「先富裕起來的」有產者和在改革開放中下崗貧困和在城市化過程走向赤貧的「失地農民」之間的界限也被抹殺了。好象大家你我都是公民，都是平等的，但實質是有產者的公民意識甚至是主人意識日趨強烈，而那些走向赤貧的下崗工人和失地農民不但沒有公民意識甚至處於一種失語狀態。也正因為如此，波斯波洛夫和列夫·托爾斯泰所宣導的「真正的人民性就是全民性」在俄國文學史上「不佔上風」，對中國現當代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還有就是，從邏輯上來說，當一個概念可以指稱一切的時候，這個概念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當人民就是公民的時候，人民當然也就是沒有必要存在了。

知識份子在中國左翼語境中，他從來都只是人民中的特殊的「一部分」，從來就不屬於人民社會底層。「人民」在新中國建立以後的階級論框架中，「人民大眾」「人民群眾」既不是指全體國民，同時也不是先天上具有種族特徵的群體。從階級尺度看，人民是無產者（「資產階級」的對立面）；從文化尺度看，人民則被界定為「知識階層」的對立面。這是

中國左翼革命出於革命的需要所設定的。

結合中國文化史，「人民」漢語的本義，所指稱的就是黎民百姓。知識份子則是「士」，並且「學而優」則成為「仕」。知識份子和人民分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知識份子當然不是「人民」。在中國五四前後，雖然在「勞工」、「庶民」、「平民」、「民眾」、「人民」等詞語的理解上，知識份子還存有許多疑問，但基本含義是「下層民眾」，即窮人、勞工階級、農民。

因此，在我的文章中，我也基本是「自覺不自覺地」將人民等同於「底層」，「自覺不自覺地將人民性寫作等同為某個階層寫作——如底層——寫作」。

在談論了「人民」之後，那麼再來看看「人民性」是甚麼？

人民性，從一般的意義上來，它就是人民特性的本質性概括。俄羅斯民粹主義者將人民性賦予了「人民精粹」的思想。他們將它與人民的優良品行相聯繫。正如別爾嘉耶夫所指出：「民粹主義是俄羅斯的特殊現象——斯拉夫主義者、赫爾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義者。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這種信念一直是民粹主義的基礎。」民粹之意，乃是人民的精粹，誰是人民的精粹呢？民粹派知識份子認為自己是人民的精粹，農民也是人民的精華⁵，「知識份子受到兩種力量的壓迫：沙皇政權的力量和人民自發的力量。後者對知識份子來說是一種隱秘的力量，知識份子自身與人民是截然不同的，它感到自己有負於人民，它希望為人民服務。『知識份子與人民』這一命題純然是俄羅斯命題，西方很難理解。」⁶在民粹主義者那裏，人民是一個活在精神中的形象，它是浪漫主義想像的成果，帶有強烈的情感皈依的色彩。這種引申義上的民粹主義表現為把沒有知識文化的底層勞動者（不僅僅是農民）無條件地神聖化，認為只有他們才是道德高尚、心地善良、靈魂純潔的。五四時期蔡元培提出「勞工神聖」呼號、「延安」時期毛澤東發出「做農民的小學生」號召、「文革」期間「根正苗紅」的工農血統論，便是民粹主義引申意義泛化運用的典型表現。

其實，就一個社會階層來說，說這一階層在人格上是優越性，或是卑劣的，都是不恰當的。因為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其個體人格是複雜的，是無法進行概括性描述的。而二元對立思維卻偏偏要給「人民」或「群眾」進行這樣的描述。知識份子把人民描述為精華，是出於自我救贖的需要，但現實中的人民卻往往與「理想」差別很大。於是就出現了民粹主義和啟蒙主義之間的矛盾。平民主義波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新文學最初的創作實績，如詩歌中的「人力車夫派」以及魯迅小說對民間苦痛的深刻揭示和溫情關懷，都體現了這一思想取向。一方面是知識份子的「平民」崇信，「庶民」道德優越性的張揚與首肯；另一方面是民眾的昏睡和啟蒙者的極度失望。五四前後的一批知識份子都曾陷入啟蒙主義與民粹主義相互糾纏、對立的矛盾深淵。

民粹主義人民精粹思想之下，人民當然必須是「先進」的，人民怎麼能是「落後」的代名詞呢。正是民粹主義觀念的作祟，使王先生的觀點成了典型的民粹主義的人民優越論。他只允許對人民進行精粹想像，而不能對人民進行「落後」想像。

傳統的民粹主義思想將人民想像為一個理想的實體，將它與歷史進化鏈條結合起來，而我所要說的是，其實「人民」歷史和政治的內涵都直接指向社會底層，它是一個概略性的描述，它與用精神勞動還是用體力勞動無關，它也與是否代表先進或是落後生產力無關。

但文學藝術中的人民性，與社會學範疇的人民性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左翼文學曾經在民粹主義的人民性思想的影響之下，試圖建立符合民粹主義理想的文學藝術「人物」，偉大的人民的形象。偉大的俄羅斯文學從未出現過作為「精粹」的成功的人民形象，中國現代的理論家和作家都曾對人民性進行了想像，但是，現實主義作家如魯迅、老舍的筆下人民大多是值得哀憐的人民形象；魯迅《一件小事》中「車夫」雖然偉岸，但偉岸得如此的可疑。真正建構了「精粹」的人民形象的是高爾基之後的蘇聯文學和中國現代左翼文學，但所建構出卻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一種被高度政治化了的精粹的人物和人格。這樣的人民形象其實都已經不是人民而是主流意識形態所塑造的「政治貴族」。為甚麼出現這樣的失敗的局面，其本質在於，人民性從來都是知識份子製造出來的所謂人民共同體的想像的德性。

那麼人民性，尤其文學藝術的人民性其實還是在於作家的情感立場。我們現在說杜甫的創作的人民性，杜甫有沒有塑造出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民形象？當然沒有。而我們之所以說他的創作具有人民性思想，其實說的就是他的對於戰亂中的人民的深切的同情。正如別爾嘉耶夫所說：「全部的俄國民粹主義都起源於憐憫與同情。在70年代，懺悔的貴族放棄了自己的特權，走到人民中間，為他們服務，並與他們匯合在一起。」人民性是「人民同情」的立場。我反對民粹主義的對於人民性的想像性建構，而主張回到人民同情的原初的立場上來。

中國文化的當下語境恰恰缺少的就是這樣的「憐憫和同情」。在權力和資本的合謀之下，兩極分化日趨嚴重。而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劇烈的社會震盪和九年代的商業化浪潮，一方面使知識份子的情感俯首於犬儒哲學，另一方面使他們認同資本真理。知識份子被普遍地中產階級化了，文學藝術創作普遍地資產階級化了。雄壯的主流旋律粉飾著深刻的危機，風花雪月呈現著富足安康。而與此相反，普通百姓不但生活被置入了深淵狀態，而且普遍地處於失語和噤聲狀態。

正是這樣的背景宣導文學的人民性便具有了特殊的意義（正是它促使了人民性文學思想的回潮）。

一切皆源自深切的「憐憫和同情」。我們今天重新宣導人民性，不是要為階級鬥爭的人民主義招魂，而是要借助於人民性重新喚醒消費社會、權力社會中知識份子的道德良知，喚醒他們內心中的人道主義同情，喚醒他們作為社會的精英所應該具有的社會責任感。在這樣的情況下，重新宣導人民性，就是要求作家和評論家為人民「代言」，代那些草根階層發出苦難的呼號。

在這裏，另外一個問題隨即產生，也就是王先生所擔心的「人民話語霸權」問題。但是人民性可能等同於階級性，但階級性就一定會導致「鬥爭的邏輯統治了文學藝術家」的結果嗎？在革命現實主義那裏，將人民性與階級鬥爭思想掛鉤，從而使人民具有了更加複雜的內涵。民粹主義之所以能夠同馬克思主義實現融合，重要的是其他們都看到了社會中存在不同利益階層和這些階層之間的矛盾。但是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家在對民眾進行表現的時候，受到強烈的歷史衝動的誘惑，他們主張從「歷史的必然趨勢」去表現民眾，當早期的革命文學作家還處於在野地位的時候，他們還能夠對底層人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但就是這樣他們的歷史本質論往往使他們對豐富的民眾生活被抽象、簡單化為單一的階級鬥爭，作家的主體存在被無條件取消，寫作就是作者走向群眾、參加鬥爭的實踐過程。人民的形象也就塑造為高大的工農兵的形象，一種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工農兵。民粹化背後潛隱的元話語仍然是革命的需要，現實鬥爭的需要。人民同情的思想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人民精粹的思想。

正如有的理論家所看到的，在特定的革命語境中，「由於人民被定義為特定階級為主體的群體，因此，是否屬於人民便取決於特定階級的認可，階級之間的衝突則被表述為人民與敵人的衝突。被認作『人民』一員成為個體最重要的護身符。幾乎所有人的命運都決定於『人民』的選擇和判決。如果『人民』不要他了，那麼，他在這個世界上將無藏身之地，只能被囚禁和走向毀滅。於是，以『人民』名義所造成的大悲劇成為我們這個民族無法忘卻的苦難記憶。」⁷

對於人民詩學的痛苦記憶是可以理解的。但這裏同樣存在著思維的跳躍以及由於這種跳躍所造成的邏輯的脫鉤：「人民被定義為特定階級為主體的群體」，與「是否屬於人民便取決於特定階級的認可」，並不能構成緊密的邏輯鏈條。前者是一種社會學的定義，人民這一特定的階級群體是被描述的物件，是被動的客體；而後者這個「人民」顯然具有了特殊的權力，甚至具有「認可」「選擇」「判決」「囚禁」「毀滅」的權力。這樣的權力是那個被描述的群體擁有的嗎？是那個被同情和憐憫，自己不能發出聲音而只能借助於知識群體而發出聲音的群體所擁有的嗎？都不是，那是一個第三者「以『人民』的名義」造成的。我們把不是「人民」的所作所為強加在他的身上，把帳算在了他的頭上。

我所宣導的人民性並不主張對知識個性和其他階層的個性的排斥，它不具備霸權的性質。我考慮到了人民性這一概念的歷史積澱，以及這一積澱所導致的人們的習慣性恐懼，我盡力地將人民性灌入人本精神，主張人民性應該包含著生命主體的平等意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所宣導的人民性，不是要建構一種人民人格。人民性，只是知識份子的價值立場。文學的人民性自它產生的時候起就與社會階層的貧窮和富裕的差距相關，就與知識份子的人民同情的人道主義精神相關。它雖然曾經被綁在階級論的戰車上，導致了虛假的人民性，但並不能改變人民性指向底層的本質。從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說，它是藝術家的創作姿態。它不是對人民特性的具體的概括和描摹。建構一種人民文學，所要建構的是一種作家的題材選擇傾向和情感表達傾向，人民性是文學的。宣導人民性就是要求作家對人民起一種深刻的「悲憫和同情」，正是這種深刻的悲憫和同情使人民文學具有神性的光輝。從美學的角度來說，正是深切的同情和憐憫使文學具有了詩性的光輝。

最後我想起了勃洛克的一句話，他說：「即便我們久已不再對人民頂禮膜拜，我們也不能背棄或不再關心人民，因為我們的愛和思想素來傾向人民。」⁸

註釋

- 1 王曉華： 我們應該怎樣建構文學的人民性 ，《文藝爭鳴》， 2005年第2期。
- 2 朱學勤：《道德理想王國的覆滅》，上海三聯書店1994，111頁。
- 3 文池主編：《俄羅斯文化之旅》，北京新世紀出版社2002，第171頁，第169頁。
- 4 陶東風： 大眾化與文化民族性的重建 社會理論視野中的58、59年新詩討論 ，《文藝研究》，2002年3期。
- 5 同註3 。
- 6 同註3。
- 7 同註1。

方維保 安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主要著作有《紅色意義的生成：二 世紀中國左翼文學研究》等。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四 六期 2006年1月27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 一世紀》網絡版第四 六期（2006年1月27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